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吴越文化  中州文化  
比较研究 

黄宛峰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 吴越文化⑤中州文化 比较研究

黄宛峰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比较研究/黄宛峰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004-8203-1

I. 吴… II. 黄…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华东地区  
②文化史—研究—河南省 IV. ①K295②K29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4163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 涟  
责任校对 张小青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31.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赵洪祝			
副主任	夏宝龙	王国平	陈敏尔	巴音朝鲁
	李 强	盛昌黎	张 曦	
成 员	潘家玮	赵光君	马林云	沈立江
	侯靖方	黄旭明	陈仲方	金兴盛
	杨建新	俞剑明	陈永昊	万 斌
	郑仓元	侯玉琪	徐 辉	胡祖光
	许 江	王建满	王永昌	黄坤明
	孙文友	徐止平	厉志海	张家盟
	蔡 奇	楼阳生		

# 总 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 2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比较研究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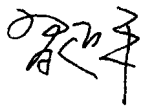
#### 4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比较研究

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 前 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各地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热的涌动，有关地域文化的论著不断推出。随着探讨的深入，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势在必行。不少学者已经有意识地从不同方面进行这种比较研究，<sup>①</sup> 而从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时段中选取典型地域文化进行比较，目前尚未见到有专著出版。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吴越与中州两个地域为典型，进行文化比较，以期从中探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有所突破。

## 一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域文化的面貌本来是丰富多彩的，但在长期大一统政治体制及相应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地域文化的个性与特质未能得到应有的彰显。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的繁荣，从根

---

<sup>①</sup>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16—19 世纪社会转型期苏州与徽州的社会文化比较研究”；山东省社联 2004 年组织了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于 2006 年由群言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各区域文化几乎无一遗漏，均有文章涉及。《史林》2004 年第 2 期、2005 年第 2 期先后刊出《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明清苏州、扬州、徽州三地风俗的互动互融》，则从特定时期、地域、阶层入手进行探讨。

## 2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比较研究

本上讲是思想解放的产物。社会的转型，思维的活跃，促使人们反思历史本身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要求了解地域社会生活的个性与本色，挖掘与发扬不同地域文化中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内容，延续文脉，传承文明，这是世纪之交一种可喜的文化现象。

然而，全国范围内不断升温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显然也有急功近利的成分，如各级地方政府对外宣传的需要，开发旅游业的需要等等。在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地域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是过高评价研究对象的价值，赞扬有余，批判不足。“人人都说家乡好”，地域文化研究过程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抬高某一地域的文化品位与质量，夸大其历史意义。“开放性”、“进取性”、“兼容性”、“创新性”等雷同的词语经常出现在不同地域的研究论著中。这些“特色”往往难以真正彰显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君主专制的社会，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而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往往是正面肯定多，谈积极意义多，谈消极意义或局限性少。

二是动态过程注意不够，关键时期注意不够。为彰显个性，突出特色，往往用定性的几句话去概括、表述某一地域文化特点。而地域文化长期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往往很难用几句话涵盖，因而也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结论。

三是个性研究多，共性研究少，地域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少。地域文化当然以研究个性特征为主，但研究个性必须探讨共性，不注重共性就没有普遍意义。从各地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来看，有的明显具有地方特色，有的则超越了地域界限。从全国范围来看，任何文化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尤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思想观念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有

人形容中国“凡饮水处便有儒家”，并非虚言。各地域文化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均应关注。

有比较才有鉴别，区域文化之间的比较可以相对客观地审视不同的区域文化，从中得出一些新的认识。本书以吴越与中州为研究对象。吴越的地理范围，大体以春秋战国时期吴国、越国故地为准，即古代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今天的江浙沪长三角地区。中州取狭义“中原”的概念，指古豫州一带即今河南省及其周围地区。<sup>①</sup>时间则限定在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选取中国古代，选定吴越与中州这两个地域进行比较，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一是两地域在南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中国古代南北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季羨林先生在《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总序中说：“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差异是南北问题，南方以长江文化为代表，北方则以黄河文化为代表。”长江流域上游是巴蜀文化，中游是楚文化，下游是吴越文化。吴越处于中国的东南部，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稻作农业区域。中州在古代因地处九州之中而得名，它位于黄河中下游，中国的腹心地带，是北方旱作农业的典型代表。一为东南水乡，一为中原腹心，吴越与中州两地相映成趣，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价值取向，均有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然而，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有差异，更有交流与融合。中州与吴越两地域在南北文化交流方面亦具有代表意义。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相辅相成，唇齿相依。郑樵曾说：“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极天地之东。大江自中国之西而极中国之东。天地所以设险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

---

<sup>①</sup> 广义的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的全部或部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州，代表了黄河文化的核心部分。

#### 4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比较研究

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为固，吴越依大江以为固。”<sup>①</sup>北方的长城与黄河是阻断草原游牧部落铁骑强有力的屏障，为南方遮风避雨。长江之所以能够成为江南的天然屏障，首先得力于黄河流域的屏蔽和抵挡。而当中原汉民族面临北方强力侵扰岌岌可危之时，中华文明有广阔的退身之地，长江以南的吴越一带成为汉民族的最佳避难场所，汉文化薪火相传的基地。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州的巨大劫难，却是吴越的重要发展机遇。西晋到东晋，北宋到南宋，朝廷搬家，衣冠南渡，百姓迁徙，这两次意义重大的南迁正是中州与吴越的对接，中州文化从宫室制度到民间风俗整个移植到吴越。中原文化得以在江南延续，与当地文化结合，焕发出新的活力。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化超过北方文化，南宋以后吴越一带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文化重心，正是南北文化交融的成果，中州文化与吴越文化的融合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

二是两地域文化的兴衰具有典型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州是先盛后衰，吴越则是先弱后强。中国文明起源之际，东南的良渚文化与中州的河南龙山文化独立发展，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品位与成就。而中州率先跨入文明门槛后，夏商周三代至东汉，中州基本代表的是华夏文化、核心文化、中央文化，吴越则是偏于东南一隅的边缘文化，受到中州文化强有力的辐射与影响。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吴越文化勃然兴起，锐气逼人。南宋以后，中州日渐衰落，吴越成为经济最富庶、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中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经济重心、文化重心却在吴越。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中州的辉煌开其端，以吴越的辉煌壮其尾。在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发展

---

<sup>①</sup>（宋）郑樵：《通志二十略》卷四一《郡邑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

历程中，吴越与中州的文化兴衰过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两地域的文化比较，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示中华大地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风貌，反映中国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势，揭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互动互补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规律。探讨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对于认识各地域文化的特征及其长短优劣，可能会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为当代区域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 二

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观照中州与吴越的文化，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趋势：中国古代社会前期，中州处于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区，中州文化的底色是政治文化，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发展，并不断强化，三代为其开端，东汉为其定型期。它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古代社会得以长期延续。吴越在先秦两汉一直被中原视为蛮夷之地，处于华夏文化的边缘区域，六朝是其文化发展与转折的关键时期。北方士族与江南风物以及土著贵族的结合，使吴越文化站在反思北方文化的高起点上，形成了思辨、刚柔相济的特质。自此以后，吴越文化中艺术化、世俗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较多地体现出非主流文化的一面。

首先看中州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与同期的良渚文化相比，祭祀、墓葬内容并不丰富，但中州却率先建立了国家。中原逐鹿，战争频繁，锻炼了中州人独特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夏、商、周相继在中州建都，便赋予了中州文化一种特定的内涵：它是中央文化、核心文化，在中国文明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

## 6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比较研究

中州是中国古代政治殿堂的奠基石。其政治文化特色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鲜明的都城文化色彩。中州是最早产生国家形态的地区，而且一直是华夏族聚居的核心地区，因而都城众多。夏商两朝在此建都，西周以洛邑为东都，东周王室仍在洛邑，所以司马迁概括道：“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sup>①</sup> 中州的安阳、洛阳、开封、邺等都城中，以洛阳的政治文化内涵最为厚重。有学者指出，河图洛书的政治理想“使该地域成为政治文化圣地，长期保有神秘的文化原典意味”。<sup>②</sup> 东汉的洛阳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都城规划与礼制建筑的理念上承三代，下启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汉族的统治者自然继承其制，少数民族的帝王也充分利用都城文化资源为其统一大业服务。北魏孝文帝之所以坚持以洛阳为都城，便是洞察到了洛阳地理位置的优势和都城文化的影响力与凝聚力。隋唐以洛阳为东都，北宋以之为西京，金末以其为中京，洛阳似乎总不失王者风范。北宋定都开封后，仍以洛阳宫殿为样本建造皇宫。

中州都城文化的外在形态是礼制建筑，实质内容便是中央观念。中国古代宫廷前殿后寝与纵深的对称布局方法在商代宫殿中已见端倪。中国礼制的形成也在商代。商周礼制在考古学中反映最突出的便是祭祀之礼。《国语·鲁语上》载：“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祭祀是国家头等重要之事，主持祭祀的人“代表”天意，被罩上了神秘的光环。而明堂之制亦在东汉的洛阳确立起来。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任何一个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它的礼仪性建筑。明堂正

<sup>①</sup>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

<sup>②</sup>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页。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最重要的礼仪性建筑。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承天行化、顺时布政的明堂思想。”<sup>①</sup>在改朝换代频繁的中国古代社会，旧王朝的宗庙往往被毁，而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及其政治理念却受到每一个王朝的尊奉，因为它代表的是顺承天意的教化，是每一个王朝都必须借用的政治法宝。

中央观念的形成和深化与中州的都城文化密不可分。周公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建都理论的人，其核心即是强调建都必于“天下之中”。“立都必于中土”的观点在汉代以后得以强化，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同。而地理上的“天下之中”与政治上的“天下之中”似乎是相辅相成、顺理成章的。

二是政治理论在中州的孕育与发展。若简单勾勒一下先秦至两汉的政治思想史，便可以发现，中州君主与士人在三个重要阶段的思想建构不可忽视。首先是夏商时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走的道路与西方不同，这是一个军事征服的过程，是权力集中、首领独断、君主专制的过程。从夏禹、商汤到盘庚，对臣民声色俱厉的训话充分显示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被称为“中国第一代文化人”的商王朝的巫史，所起的作用即是沟通人神，主要是为君主政治服务。接着是周秦。三晋是法家的故乡，<sup>②</sup>商鞅、吴起、韩非、李斯这几位著名的法家人物，无一不出自中州。他们构筑起了法家的理论体系，并将之成功地运用于政治实践，而他们本人却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印证出政治的残酷。西汉时期，贾谊第一个响亮地提出移风易俗的口号，要求用儒家的礼治取代秦的法家政治；晁错、桑弘羊则主张以法家学说治理天下。戴圣编定的《礼记》，是儒学经典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先秦

<sup>①</sup> 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sup>②</sup> 春秋时期的铸刑鼎，灭公族，率先在晋国实行。

## 8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比较研究

至汉士人们的思辨水平。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宣称“以柔道理天下”，是对西汉“霸王道杂之”治国方略的修正，真正确立起了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至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北宋二程的洛学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它由黄河流域广泛地传播到大江南北，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的确立。中州士风的特点是刚劲激越，士人有积极的从政意识。士人一士族—士族门阀，是儒学被奉为一尊后必然出现的现象，而最有名的两家士族门阀——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皆出自中州，亦可谓势在必然。以中州士族为核心的东汉党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出现的士大夫群体形象，先秦儒家倡导的“士志于道”的儒生特质，通过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实践与集体献身而充分昭示于天下。他们用生命而不是用笔墨去诠释儒家道义，从而铸就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

北宋司马光有诗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无疑是中州政治文化的缩影，司马光此语主要是从王朝更替、政治兴衰的角度着眼。而从文化演变的过程来看，这首诗也是意味深长的。

中州文化具有根源性、辐射性、延续性的特点。正如“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一样，中州在中国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初始阶段亦处于核心地位。《唐律疏议·释义》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中国”、“华夏”之称均源自先秦的中州。中州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调，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与导向性，而且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同化力。东汉的中州文化作为核心文化，充分利用儒学的伦理性整合社会，对汉民族及汉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汉文化”，即“以汉字为载体，以



汉族文化为主体，以汉朝为标志”，<sup>①</sup>汉文化有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有其源头与主流，中州无疑是先秦两汉华夏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汉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北宋二程的洛学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群体观念、社会责任感的培育，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从东汉的经学到宋代的理学，它们一经成为官方哲学，被奉为独尊，也就受到了根本的制约，失去了创造力与活力。大一统的思维模式对中州士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元代的中州理学家许衡曾将人心比作“印版”，士人囿于统治者钦定的知识范围，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权利从根本上被取消了。这似乎是中州文化衰亡的征兆。中州文化昂扬进取的内在活力被扼杀了，它的停滞与衰败也是必然的。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大举入侵，中州的长期战乱，黄河的多次水患，这一切使中州经济屡受重创，文人星散，民众流徙。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中州遂一蹶不振。

中州的科技文化发展与政治兴衰有密切关系。从中国科技史的角度看，汉代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后世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而张衡制作的地动仪与浑天仪，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东汉发明的造纸术，这些足以代表当时中国科技水平的成果，都出现在中州，自然是由中州的文化中心地位所决定的，是由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所决定的。汉代是一个制度疏阔的社会，汉代的洛阳是人文荟萃、思想活跃的地方。汉代以后，在改朝换代的周期性震荡中，中州屡经战乱，元气大伤，很少再出现有影响的科技成果和人物了。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传统的思维模式重社会而轻自然，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往往是从政治的或生活实用的需要出发。如张衡的天文学成就无疑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科学水准，

---

<sup>①</sup>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